談山彪鎮一號墓出土的一件盥盤及其相關問題



圖一　山彪鎮一號大墓盥盤

李永迪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引言

本所於1935年發掘的河南汲縣山彪鎮一號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玉器。其中銅器與山西渾源李峪、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銅器，以及山西侯馬鑄銅遺址出土陶範的風格極爲接近，屬於華北晉系青銅器，學者多有說明。❶學界目前對山彪鎮一號墓的具體國別及年代雖然並沒有定論，但大體均認爲應屬於春秋、戰國之交以降，晉國乃至於三晉的貴族大墓。❷

山彪鎮一號墓出土的青銅器中，有一件原報告稱爲帶細蟠虺紋的小鑑（M1：43；庫藏號R018591），個體較小，紋飾形製較爲特殊，明顯屬於南方系青銅器。從現有的考古材料來看，除山彪鎮以外，類似的銅器僅出現於江南及嶺南，而出土墓葬的時代早至春秋晚期，晚到西漢年間。本文即擬就此類銅器的出土地點、出土關係，探討其中的一些相關問題。部分問題因爲目前有關材料還不充分，只能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與推測。

二、山彪鎮出土的小銅鑑

山彪鎮一號墓蟠虺紋小鑑出土於墓的西南角，出土時底部已經破損，器身開裂變形，部分口沿亦破碎。後曾經初步修補，發表於郭寶鈞1959年所著《山彪鎮與琉璃閣》。❸2000年本所商請北京歷史博物館技術人員來台協助修復早年中原文物時，曾予以重新修復。❹經二次修補復原後，器身形體較早期修補工整，大體爲圓形，兩耳之間測得的直徑爲35.7公分，自器耳測得的器高爲13.7公分（圖一，見前一頁）。鑑的形體較小，直口、平沿、方唇，器身在口沿以下稍斂，肩部微鼓，肩部以下斜收，平底無足。有兩個素面環形耳，位於口沿下方，不帶銜環。口沿以下及器上腹部，各有一帶細蟠虺紋。兩帶蟠虺紋之間則以兩周綯索紋隔開，綯索紋之間有一折稜，恰爲器身最大腹徑位置。下腹部另有一圈填以雷紋的垂簾三角紋，與上方的蟠虺紋仍以一條綯索紋區隔。唇沿及折稜部位均無紋飾。原報告中所稱的蟠虺紋，實際上並無虺或蛇的圖像，而是以 形的折線爲基本單元，頭尾穿插連結組合而成，形成連續的紋飾帶。每一折線單元的轉折處與線段中部並飾有多個突出的浮雕圈點。口沿下的紋飾帶由兩條平行的圈點折線組成，器腹則由四條平行帶圈點折線組成（圖二）。爲行文方

＊ 本文在寫作期間曾蒙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長壽先生，上海博物館譚德睿先生、廉海萍小姐，北京大學吳曉筠小姐，以及兩位審稿者等提供了寶貴的建議及協助，僅此表示謝意。

❶ 如：高明，〈中原地區東周時代青銅禮器研究〉，《考古與文物》1981(2):68-82;1981(3):84-103; 1981(4):82-91；Jenny So,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Arthur M.Sackler Foundation,1995), p.426；黃銘崇，〈山彪鎮一號墓的歷史座標〉，《古今論衡》2000(5):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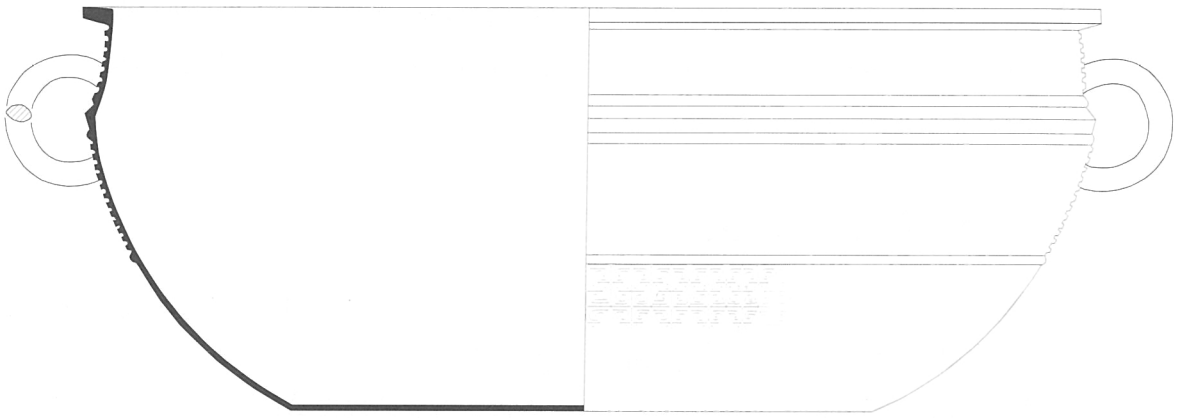
❷ 有關各家對山彪鎮一號大墓年代的討論，可參見陳昭容所列簡表（〈論山彪鎮一號墓出土周王假戈的作器者及時代〉，《古今論衡》2000(5):32）。

❸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圖版貳貳：1（科學出版社，北京，1959）。

❹ 北京歷史博物館修復人員爲趙家英、陳仲陶，本所參與人員爲王俊元、杜彥良。

便，這類紋飾仍沿舊例，通稱爲蟠虺紋。

小鑑器身在兩環耳位置各可見一條範線，範線自口沿下方貫穿紋飾至器腹，表明器身範可能由兩塊外範組成（圖三箭頭 1）。兩環耳在環中央均有一範線，將環對分。環耳與器身外壁相接處可見多餘金屬覆蓋器身（圖三箭頭 3），器耳在器身內壁則有二不規則圓形的扁平端頭（圖四），顯示是先將器身鑄好，並在器身預留環耳接孔，而後另行製範，將環耳鑄接到器身。環耳已經鬆動，但因位於器內壁的端頭將環耳鎖定，不致脫落。環耳上仍可見澆口殘留（圖三箭頭 2）。器身在與環耳相接位置的四周均無紋飾（圖三），高度也較帶紋飾部位低，應是爲預留環耳範鑄接位置，在澆鑄前將外範相關部位紋飾填平所造成。❺



0 5cm

圖一　山彪鎮一號大墓盥盤線圖；根據未發表原始圖重繪。（史語所祝維惠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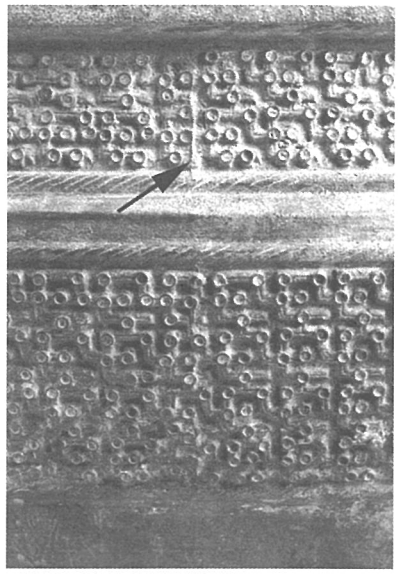


圖三



圖四

❺ 這樣的製作方法較明顯地破壞了器身紋飾的完整。侯馬出土的陶範顯示侯馬工匠採用複合範的技術來製作類似的器耳，一次澆鑄中同時澆鑄器耳與器身，可避免明顯破壞紋飾。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上》（文物出版社，北京，1993），頁121、圖五六的舟範。大型鑑的器耳則採用分鑄而後銲接的方式。見R. J. Gettens,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I: Technical Stud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 C., 1969), p. 87, fig. 81; 吳坤儀，〈太原晉國趙卿墓青銅器製作技術〉，《太原晉國趙卿墓》，頁273（文物出版社，北京，1996）。


圖五

在兩道圈點蟠虺紋飾帶上，另可見較細、但不上下貫穿全器的紕縫（圖五）。這些紕縫的位置並不完全對稱，間隔距離不等，或因經過打磨修整，或因銅銹覆蓋，有的上下兩道蟠虺紋上均見，有的僅見於上層蟠虺紋。在紕縫的兩側，也可以見到紋飾不完整、銜接不上的現象。若結合紕縫與紋飾不連續處，可看出以合範線對分的每一半周長上，各有三處紋飾銜接不上的接縫，亦即每一半器身周長分別由四段紋飾組成，各段紋飾長短不一。因這類紋飾是由小單元不斷重複組合而成，紋飾的不連續處極難察覺。這些特徵顯示紋飾的製作方式與已知的侯馬銅器有相同之處，應是利用花紋塊（pattern block）複製的技術，將同一花紋模的紋飾反覆複製，再將泥片剪裁修整製範。❻銅器上較細的紕縫應是花紋泥片相接的位置，而不是器身範的合範處。

與山彪鎮一號墓蟠虺紋小鑑類似的銅器另有數件，下文將逐一討論。其中江西靖安出土的一件帶銘文的徐國鑄器，形製大小與山彪鎮小鑑相仿，而器銘自名爲「盥盤」。❼由於這一類器物形體較小，紋飾特別，與一般習稱爲鑑的器物（如吳王夫差鑑）形狀雖然相似，但仍可以截然區分，彭適凡先生已有所申論，並提議以「盥盤」稱呼這類器物，學者多從之。❽不過銅器銘文中自名爲盥盤的例子不少，其器形或爲盤，或爲匜，與這一類的小鑑仍不相同，❾而靖安徐器自名銘文的隸定應爲「浣盤」，陳昭容已做詳證。❿惟「盥盤」一詞使用已久，以下僅暫因先例，沿用彭說，將此類器物通稱爲盥盤。

❻ 有關侯馬銅器紋飾的製作方式，Bagley曾有精闢的說明，見： R. Bagley, "What the Bronzes from Hunyuan Tell Us about the Foundry at Houma", *Orientations* 1995 (January): 46-54. Pattern block的名稱即Bagley所提出。見R. Bagley, "Replication Techniques in Eastern Zhou Bronze Casting", *History from Things: Essays on Material Cultur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1993), edited by S. Lubar and W. D. Kingery, pp. 231-241. Pattern block技術的起源與流行範圍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❼ 江西省歷史博物館、靖安縣文化館，〈江西靖安出土春秋徐國銅器〉，《文物》1980(8): 13-15; 圖版2: 1。

❽ 彭適凡，〈談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稱問題〉，《文物》1983(6): 66-68。後收入《江西先秦考古》，頁160-164（江西高校出版社，南昌，1992）。

❾ 陳昭容，〈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關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一本、第四分(2000.12)：857-932。

❿ 見前引文及注㊸。另、張臨生以爲徐國銅器自名的名稱，常與他國不同。見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七卷、第二期 (1989)，頁16。

三、相關的出土與傳世器物

山彪鎮一號墓出土的蟠虺紋盥盤，形製特殊，一般不多見。除山彪鎮一例以外，目前已知的青銅考古發掘品與博物館藏品如下：

江西靖安⓫（春秋晚期）
江西清江⓬（春秋晚期）
湖南湘鄉牛形山⓭（春秋晚期）

江蘇丹徒北山頂春秋墓⓮（春秋晚期）
江蘇鎮江金壇縣薛埠公社東進大隊⓯（春秋晚期）
江蘇邳州九女墩M3⓰（春秋晚期）
浙江紹興坡塘306號墓⓱（戰國初期）（圖六）

廣東羅定南門垌M1⓲（春秋晚期至戰國）
廣東羅定背夫山M1⓳（戰國早期）
廣東廣州南越王墓⓴（西漢）

台北故宮博物院㉑
Seattle Art Museum㉒



圖六　浙江紹興坡塘M306盥盤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5》，頁94（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

⓫ 江西省歷史博物館、靖安縣文化館，〈江西靖安出土春秋徐國銅器〉，《文物》1980(8): 13-15; 圖版2: 1。
⓬〈春秋銅鑑〉，《文物工作資料》1975(3)。引自彭適凡，〈談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稱問題〉，注3。另見〈江西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243，圖十一（文物出版社，北京，1979）。
⓭ 原韶山灌區文物工作隊，〈在華主席關懷下韶山灌區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2): 1-4; 圖八;圖版1: 3。
⓮ 江蘇省丹徒考古隊，〈江蘇丹徒北山頂春秋墓發掘報告〉，《東南文化》1988(3-4): 13-50；圖版4: 2。
⓯ 劉興，〈鎮江地區近年出土的青銅器〉，《文物資料叢刊》1981(5): 108；圖五。
⓰ 孔令遠、陳永清，〈江蘇邳州市九女墩三號墓的發掘〉，《考古》2002(5): 19-30；圖六；圖版五：1。
⓱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紹興30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1): 10-26；圖版4: 3。
⓲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羅定出土一批戰國青銅器〉，《考古》1983(1): 43-48, 29; 圖2: 8; 圖版8: 3。
⓳ 廣東省博物館、羅定縣文化局，〈廣東羅定背夫山戰國墓〉，《考古》1986(3): 210-220; 圖4: 上。
⓴《西漢南越王墓．上》：285-286;《西漢南越王墓．下》：彩版23: 2; 圖版189（文物出版社，北京，1991）。
㉑ 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七卷、第二期 (1989)，頁16；圖版IX: 1-5。
㉒ 國立故宮博物院，《海外遺珍：銅器》，頁146，圖版145（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1985）。

以上青銅盥盤紋飾的安排基本相同，均分層施以浮雕蟠虺紋、綯索紋、三角紋，與山彪鎮的盥盤風格一致。如口沿下與器上腹各有一道由　形或類似幾何折線搭配浮雕圈點組成的主體紋飾，上下主體紋飾以綯索紋區隔，綯索紋之間往往夾有一道折稜。器下腹一般飾以垂簾三角紋，但也有素面不另施加紋飾。只有靖安盥盤器在折稜以下施加多道弦紋。有的盥盤則在唇沿及折稜位置飾有雷紋。這類幾何折線搭配浮雕圈點的蟠虺紋較特殊，目前僅在盥盤上常見，使這類器物明顯自成一類。

上列盥盤的形體也都很接近，但若予以細分仍有所差異。比如器耳可以區分出無耳、環耳、獸首鐶耳、獸首銜環耳等的不同；器足可分無足、蹄足、片狀足或尖狀足。各盥盤形製與紋飾可參考表一，器高與口徑可參考表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西、浙江一帶的春秋戰國小墓中，可見這類盥盤的仿銅陶器或原始瓷。這些仿銅陶器、原始瓷的年代可能稍晚，其形製與青銅盥盤並無二致，惟個體較小，紋飾則均予以簡化：

江西貴溪M10㉓（仿銅陶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浙江紹興鳳凰山M2㉔、M3㉕（仿銅陶器、原始瓷；戰國）
浙江餘杭崇賢M1㉖（仿銅原始瓷；戰國）
浙江上虞蒿壩董村牛山M17㉗（仿銅原始瓷；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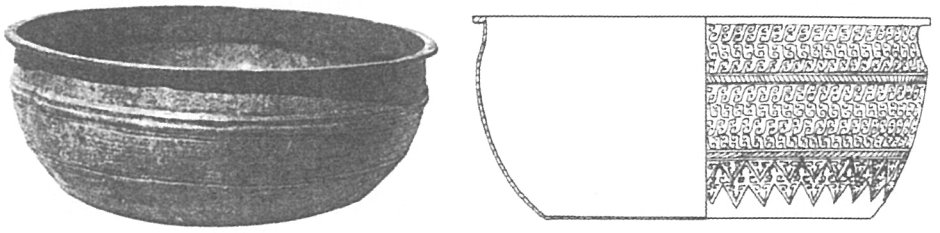
如從形製考慮，可將已知的盥盤，包含仿銅陶器、原始瓷分爲六類。但由於這種器物較少，分布範圍較廣，兼部分器物爲零星發現，細部的時間序列尚有待確定，因此以下的區分僅純就形製而言，並不具分型分式或器物序列的意義。

A類：平底無足，無器耳，口沿下及腹部均飾以圈點蟠虺紋。紹興坡塘306號墓出土的盥盤（圖六，見上一頁；原報告稱作鑑）屬於此一類。紹興坡塘盥盤主體紋飾帶以三道綯索紋區分，其中位於肩部的兩道綯索紋之間夾有一道折稜，與山彪鎮盥盤相同，但器下腹部則爲素面，沒有紋飾；唇沿及折稜均飾有雷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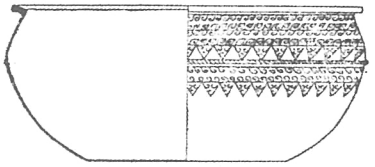
與紹興坡塘盥盤相關，但紋飾不同、個體較小的，還有江蘇邳州九女墩M3出土的銅盤（圖七；M3：34，類似盤共出五件）。該盤主體紋飾爲上下兩帶S形斜雲雷紋，器下腹部爲三角紋，紋飾帶以兩道綯索紋區隔，肩部亦有折稜。廣東羅定南門垌M1也出土一件與九女墩M3盤類似的器物（圖八；M1：6，原報告稱作鑑），器身上

㉓ 江西省歷史博物館、貴溪縣文化館，〈江西貴溪崖墓發掘簡報〉，《文物》1980(11): 1-25; 圖版2: 1。
㉔ 紹興縣文物管理委員會，〈紹興鳳凰山木槨墓〉，《考古》1976 (6): 392-394; 圖版10:6。簡報中提及兩件三足盤，但僅一件有圖。
㉕ 紹興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浙江紹興鳳凰山戰國木槨墓〉，《文物》2002 (2): 31-37; 圖2: 4。
㉖ 餘杭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餘杭崇賢戰國墓〉，《東南文化》1989 (6): 121-125；圖四：1。
㉗ 黎毓馨，〈上虞董村牛山春秋至宋代墓葬〉，《中國考古學年鑑1996》，頁145（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圖版參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精華》，頁195（文物出版社，北京，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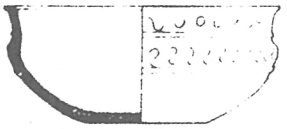
半飾以S形雲雷紋，一道絢索紋及兩道三角紋，器下腹部爲素面。這兩件器物紋飾大小與坡塘盥盤的差距較大，或爲另類器物。紹興鳳凰山M3出土的一件原始瓷缽（圖九；M3：1），以及餘杭崇賢M1的一件原始瓷洗（圖十；M1：15）應是模仿九女墩M3：34盤這類銅器，兩者亦飾以S形紋飾。廣東羅定南門垌M1、紹興鳳凰山M3、餘杭崇賢M1均另有盥盤出土。



圖七　江蘇邳州九女墩M3盤 圖片來源：《考古》2002（5）：23；圖版五：1；圖六（線圖）



圖八　廣東羅定南門垌M1鑑
圖片來源：《考古》1983（1）：44，圖二：6。



圖九　浙江紹興鳳凰山M3：1原始瓷缽。圖片來源：《文物》2002（2）：34；圖八。



圖十　浙江餘杭崇賢M1：15原始瓷洗。圖片來源：《東南文化》1989（6）：124；圖四：9。

B1類：平底無足，帶環耳。山彪鎮一號墓出土的盥盤爲此類（圖一，頁144），其口沿下及腹部飾以圈點蟠虺紋，下腹部飾以三角紋；另有三道絢索紋將紋飾帶區分開，唇沿及折稜無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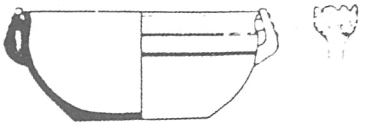
B2類：平底無足，帶獸首鐶器耳，僅在口沿以下有圈點蟠虺紋，肩部折稜帶雷紋，折稜以下的器身飾以數道弦紋。銅器僅靖安徐王義楚盥盤一例（圖十一）。浙江餘杭崇賢M1出土了三件平底無足、口沿下有兩道弦紋的仿銅原始瓷盥盤（圖十二；原報告作雙耳洗），形製與此類相近。



江西靖安盥盤銘文
圖片來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二》，頁357（文物出版社，北京，1987）。

圖十一
江西靖安盥盤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5》，頁148（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





圖十二　浙江餘杭崇賢M1：11原始瓷盥盤
圖片來源：《東南文化》1989（6）：124；圖四：1。

C1類：平底，帶三蹄足、環耳，或帶銜環。湖南湘鄉牛形山（圖十三）與台北故宮盥盤（圖十四）屬此類。湘鄉盥盤主體紋飾與B1類相似，帶三個蹄足，但器耳製作精美，上部爲蟠龍紋組成的獸面，下部做捲尾狀，並帶銜環。這樣的器耳亦見於羅定背夫山M1：66的銅鑑上（圖十五），惟此一銅鑑器身較高，口徑也較大，主體紋飾爲交織的蟠螭紋，器耳無銜環，三足爲蹄形，另外在兩獸首器耳之間的器腹上，有兩個對稱的綯紋環，與盥盤應不是一類器物。值得注意的是，背夫山的這件銅鑑與淅川下寺M3出土的一件銅鑑（圖十六；M3：19），在大小、紋飾、形製上基本一致，僅多三個蹄足，應爲楚器。



圖十三　湖南湘鄉牛形山盥盤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5》，頁124（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

圖十四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盥盤
圖片來源：《故宮學術季刊》第七卷、第二期（1989）：64；圖版IX：1。



圖十五　羅定背夫山M1：66銅鑑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5》，頁126（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





圖十六　淅川下寺M3:19銅鑑
圖片來源：《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圖版八三：2（文物出版社，北京，1991）。

台北故宮的盥盤也帶三個蹄足，與這一類盥盤相似，但器耳爲帶繩紋的環耳，無獸首或銜環，主體紋飾與其他盥盤相同，由帶圈點的　　形折線組成。台北故宮盥盤的圈點紋中鑲嵌有綠松石，是此類器物唯一帶鑲嵌的例子。㉘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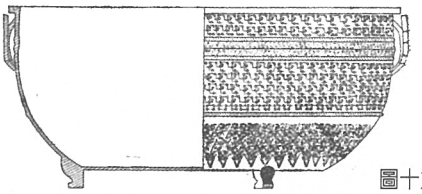
C2類：平底，帶三蹄形足、兩獸首鐶器耳，紋飾與B1類相同，爲上下兩層圈點蟠虺紋，三道絢索紋，一周三角紋。本類包括丹徒北山頂（圖十七；MJB：10）、鎮江金壇（圖十八）、羅定背夫山（圖十九；M1：62），以及西雅圖美術館的盥盤（圖二十）。



圖十七　江蘇丹徒北山頂MJB：10盥盤
圖片來源：《東南文化》1988（3-4）：圖版四：2。



圖十八　江蘇鎮江金壇盥盤
圖片來源：《文物資料叢刊》1981（5）：108，圖五。



圖十九　廣東羅定背夫山M1：62盥盤
圖片來源：《考古》1986（3）：213，圖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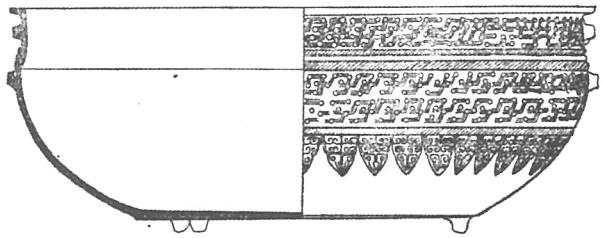
圖二十　美國Seattle Art Museum所藏盥盤
圖片來源：《海外遺珍：銅器》，頁146，圖版145（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1985）。

㉘ 從考古發掘出土盥盤均不帶綠松石鑲嵌的情形看，不能排除台北故宮盥盤上的綠松石爲後加的可能。

㉙ 依據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中所發圖片，可推測台北故宮盥盤環耳的鑄造與前注❺所引侯馬舟範方式相同，是將環耳範嵌入器身範內，與器身一次澆鑄而成。故宮盥盤器身紋飾帶也可見紋飾泥片的剪裁。參見張文圖版IX: 1-5。

C3類：與C2形製基本相似，平底，帶兩獸首鐶器耳，也有三個足，但簡化爲短片狀或尖狀；紋飾與B1、C2類相似。羅定南門垌M1：5（圖二十一）與南越王墓出土的盥盤（圖二十二）屬於此類。另外江西清江出土的盥盤形製與前兩件基本相同，但在相當於器耳的位置上，僅殘餘四個金屬短柱頭，缺少器耳（圖二十三）。羅定南門垌M1：5在出土時獸首鐶器耳已經脫落，從發表照片及線圖上可以見到相同的短柱頭，因此推測江西清江的盥盤原本可能亦有類似器耳。





圖二一　廣東羅定南門垌M1：5盥盤
圖片來源：《廣東出土先秦文物》，頁279（香港中文大學，香港，1984）；《考古》1983（1）：44，圖二：8（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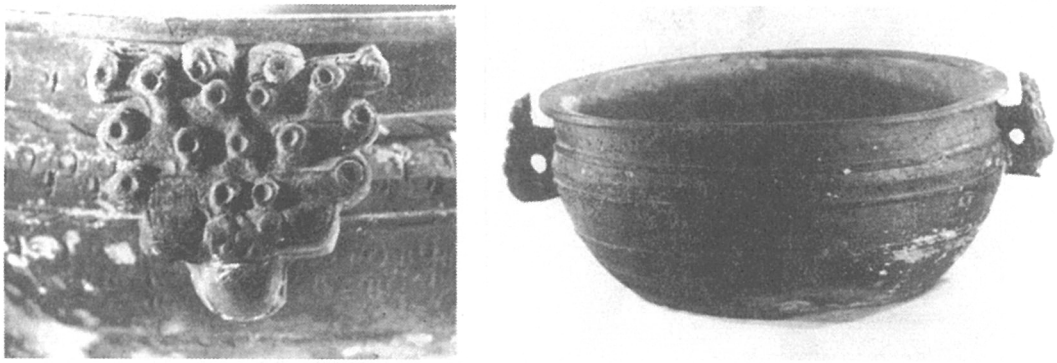


圖二二　廣東廣州南越王墓盥盤
圖片來源：《西漢南越王墓·下》，彩版一三：2（文物出版社，北京，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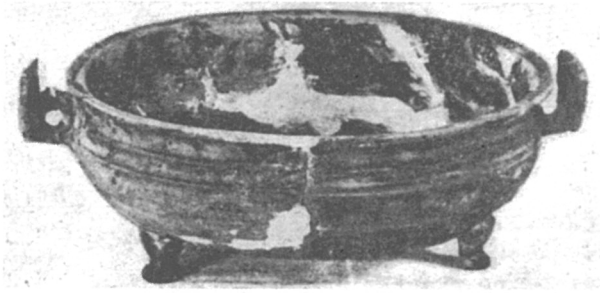
圖二三　江西清江盥盤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5》，頁148（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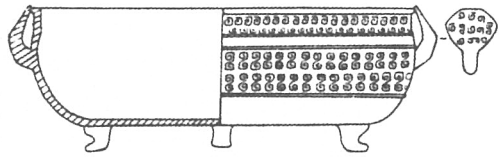
江西貴溪崖墓出土的陶盥盤（圖二十四）帶有兩個獸首鐶器耳，學者一般引述時，每將之與靖安徐王義楚盥盤對比。但貴溪陶盥盤口沿以下及腹部均施加簡化的雲雷紋，有三周絢索紋加以間隔，原報告中並描述器底有三足斷痕，因此形製實際更接近上述的C2或C3類。紹興鳳凰山M2（圖二十五；原報告作三足洗）、M3（圖二十六；M3：50，原報告作盆），上虞牛山M1（圖二十七；M17：20，原報告作獸面鼎）出土的陶、原始瓷盥盤形製一致，同屬於C2類，均帶二獸首鐶耳，三蹄足。鳳凰山M2盥盤紋飾簡化爲連珠紋及S紋，鳳凰山M3盥盤紋飾則與貴溪M10相似；上虞牛山M1盥盤飾以與鳳凰山M3盥盤類似的渦旋紋。



圖二四　江西貴溪M10：6黑陶盥盤。圖片來源：《文物》1980（11）：圖版2：1。

圖二五　浙江紹興鳳凰山M2黑陶盥盤
圖片來源：《考古》1976（6）：圖版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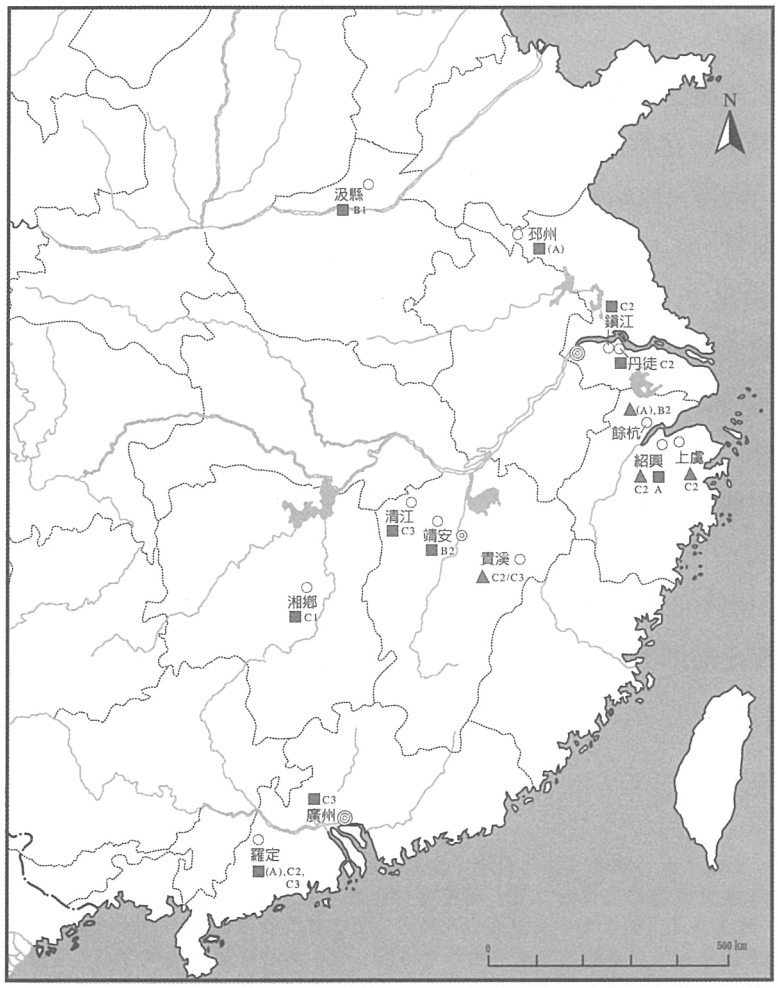
圖二六　浙江紹興鳳凰山M3：50黑陶盥盤
圖片來源：《文物》2002（2）：32；圖二：4。

圖二七　浙江上虞牛山M17：20原始瓷盥盤
圖片來源：《浙江考古精華》，頁195（文物出版社，北京，1999）。



以上各類盥盤在紋飾、形製有相當的一致性，明顯屬於同一類型器物。除了山彪鎮盥盤出土於河南，博物館藏品不明出土地點外，其他均出土於江南以及嶺南（圖二十八）。而除南越王墓例的出土年代最晚、可能爲年代較早的傳世隨葬品外，[30][31]其他盥盤年代都在春秋晚期至戰國之間。如依類型來看，以C2的數量較多，出土的範圍也較廣。

以下依出土地理位置，簡單描述這類器物及出土墓葬的概況，希望能藉此瞭解其文化系絡，以進一步討論盥盤在中原貴族墓葬出土的意義。其中博物館藏品，江西清江、湖南湘鄉牛形山、江蘇鎮江金壇的盥盤沒有詳細的出土資料，不擬細論。江西、浙江出土的仿銅盥盤則一併在此討論。



圖二八　青銅、仿銅盥盤出土位置圖
（繪製：史語所翁慈琄、計算中心陸天璐）

[30] 南越王墓中屬於前代器物的還包括戰國玉器、銅鏡，楚式鼎，秦帶銘戈、蒜頭瓶等。李龍章認爲南越王出土盥盤爲當地鑄造，傳承於嶺南先秦青銅文化，恐非是。李說見〈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青銅容器研究〉，《考古》1996(10): 59。

[31] 早期器物做爲傳世品出土於晚期墓葬的例子很多，尤以銅器、玉器爲然。常被引用的例子有婦好墓中的新石器時代玉器，河南潢川黃君孟春秋墓中的新石器時代玉器，江蘇三里墩西漢墓出土的戰國犧尊。

江西

江西靖安

1979年江西靖安水口公社出土了三件銅器，出土地點可能爲一窖藏。其中兩件帶有銘文，一件是帶浮雕圈點蟠虺紋的盥盤，一件爲帶提鍊的爐盤。另有一件箕狀器，[32]與爐盤同出，應是配套使用。盥盤內底中央有兩行銘文：「徐王義楚擇其／吉金用作盥盤」[33]，而爐盤銘文的作器者爲徐令尹旨型，表明這三件銅器均爲徐國器物。靖安盥盤銘文中的徐王義楚即左傳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所記之徐儀楚，學界中已成爲定論。[34]靖安盥盤的時代因可定爲春秋晚期，是這類器物中唯一帶有銘文並以自名、且能確切判定所屬國別的例子。

江西貴溪崖墓

1978年江西進行文物普查時，在貴溪仙岩發現了一崖墓群，於1979年進行發掘共清理了14座墓葬。這批崖墓位於臨上清河的峭壁，利用山壁的天然洞穴加以修整而成。墓葬出土陶器、原始青瓷，而較特別的是竹木器、紡織品保存較好，提供了有關葬具，紡織器材、工具，以及紡織品等有機物品的寶貴訊息。發掘者根據陶器、原始青瓷，以及由出土木料測得的碳十四數據（2595±75 B.P.；樹輪校正2650±125 B.P.），判斷貴溪崖墓的年代當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這批崖墓中的M10屬於單洞單葬，墓室保存較好，其中出土了陶器，原始青瓷，竹木器，及骨、玉石器、料器等。[35]出土陶器中有七件爲仿銅器形製，包括五鼎、一盉，及一件盥盤。陶鼎的形式較多，有獸面鼎（原報告之I式鼎）、釜形鼎（III式）、越式鼎（IV式），及一帶蓋蹄足鼎（II式）。其中獸面鼎類似安徽舒城所出土的銅鼎，與紹興鳳凰山出土的獸面陶鼎一致（見下）；越式鼎、釜形鼎爲湖廣、江浙地區常見器形。帶蓋蹄足鼎則與曾侯乙墓中之II式（C103）、III式（C102）蓋鼎接近，[36]應是仿楚式鼎。

[32] 原報告稱爲枓，恐誤；見彭適凡〈談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稱問題〉。

[33] 陳昭容認爲徐王義楚盥盤銘文中的「𪒣」盤應當隸定爲「浣」盤，屬於春秋東土的用法，而古文「浣」每假爲「盥」。陳說詳見〈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關問題〉，頁893-894。

[34] 以徐儀楚或徐王儀楚爲作器者的銅器還有兩件自名爲「𣪘」的觶形器，均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徐國銅器散見各地，在史籍記載的徐國範圍之內反而不見，目前僅有江蘇邳州九女墩三號墓一例。見下文。有關出土與傳世徐國銅器的討論可參見以下引文：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釋文，頁159-164。
董楚平，《吳越徐舒金文集釋》，頁248-336（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1992）。
陳公柔，〈徐國青銅器的花紋、形製及其他〉，《吳越地區青銅器研究論文集》，頁263-274（兩木出版社，香港，1997）。
萬全文，〈徐國青銅器研究－兼論徐楚青銅文化之關係〉，《故宮文物月刊》第十六卷、第一期(1998):84-100。

[35] 據原報告圖十一。

[36] 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下》（文物出版社，北京，1989），圖版五三（LIII）。

江、浙

江蘇丹徒北山頂

江蘇丹徒北山頂春秋墓位於北山山頂，1984年發掘，爲一帶封土的春秋晚期大墓。墓坑是將山頂岩石修成平台以後，再向下挖掘而成。墓坑平面呈刀形，有一墓室及一墓道，墓坑南北兩側各有一平台。墓坑之上有一橢圓形大面積封土。墓室由於被盜，遺留物不多，器物主要出自墓道，包括了禮器、樂器、兵器、車馬器及工具，並有幾件帶銘文的銅器，如甚六鼎，次□缶蓋，邆邟鎛鐘、鈕鐘，以及余昧矛。[37]其中甚六鼎，次□缶蓋，邆邟鎛鐘、鈕鐘，學者多以爲爲徐國鑄器，[38]而墓主人的身份究屬吳國或越國貴族仍有討論。[39]出土的印紋陶、原始青瓷，則爲寧鎮、皖東南春秋晚期所常見的器形。

值得注意的是，北山頂春秋墓盥盤的出土位置並不在墓道或墓室之中，而在墓坑北側的平台上，位於一隨葬人的足部。盥盤內有殘留動物骨渣，底部有煙熏痕跡，其下並有木炭與燒土痕跡，可見經過使用。發掘者認爲可能與祭祀、人殉有關。隨葬人頭部附近另出土一束銅削及一束銅刀。

江蘇邳州九女墩M3

邳州九女墩M3爲一大型土墩墓，於1993年發掘。墓室呈方形，位於生土層中，墓室以上以夯土覆蓋，形成高出地面的封土，墓底四周留有生土二層台。原報告將墓室分爲主室、前室、東西側室、兵器車馬器坑、陪葬坑及生土祭祀台。主室緊鄰墓室東壁中段偏北，四周築有土牆，與墓室其他部分區隔，其中發現一棺一槨殘留，及兩具應爲墓主的人骨架痕跡；主要隨葬品爲玉器、串珠、海貝、銅劍、銅削及陶器。大部分的青銅禮器、樂器均出於主室南側的前室，有四件甬鐘、六件鎛鐘、九件鈕鐘，另有獸面鼎、湯鼎、豆、爐盤、杖飾，及石磬等。與紹興坡塘盥盤類似的盤，共有五件，亦出土於前室。主室北側與墓室北壁之間爲兵器車馬器坑，出土戈、鉤、矛、

[37] 有關北山頂銅器銘文的討論，參見下引文：
周曉陸、張敏，〈北山四器銘考〉，《東南文化》1988(3-4):73-82。
曹錦炎，〈北山銅器新考〉《東南文化》1988(6): 41-44。
商志譚，〈次□缶銘文考釋及相關問題〉，《文物》1989(12): 53-56。
董楚平，《吳越徐舒金文集釋》，頁314-329（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1992）。
陳昭容，〈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關問題〉，頁898-901。

[38] 原發掘報告以爲上引銅器屬徐國。持相同意見的學者有，周曉陸、張敏，〈北山四器銘考〉；商志譚，見〈次□缶銘文考釋及相關問題〉及商志譚、唐鈺明，〈江蘇丹徒背山頂春秋墓出土鐘鼎銘文釋證〉，《文物》1989(4): 51-56；劉彬徽，〈吳越地區東周銅器與徐楚銅器比較研究〉，《吳越地區青銅器研究論文集》，頁195（兩木出版社，香港，1997）。持不同意見的有曹錦炎，認爲邆邟鐘及甚六鼎應爲舒國銅器，見〈關於邆邟鐘的「舍」字〉，《東南文化》1990(4): 226。董楚平從之，見《吳越徐舒金文集釋》，頁320, 323-26。

[39] 試比較原報告〈江蘇丹徒北山頂春秋墓發掘報告〉，頁42；張敏，〈吳王余昧墓的發現及其意義〉，《東南文化》1988(3-4): 52-58；劉彬徽，〈吳越地區東周銅器與徐楚銅器比較研究〉，頁196。

鏃、轄、書、馬銜等器物。主室旁的東西側室內及墓室西側的兩個陪葬坑均有殉人，其中亦有少量隨葬品，包括西側室中的一件蟠蛇紋銅尊。墓室西南角，陪葬坑與前室之間有一生土台，上置大量經火燒的獸骨。

九女墩M3共出土310件（組）器物，其中青銅器220餘件，除兩墓主外，另有十六具殉人，墓葬規模在蘇北少見。出土的九件鈕鐘均有銘文，銘文詳細資料仍待發表，但所記作器者爲「徐王之孫  」。出土的銅器許多保存較差，未予復原發表，但其中包含中原風格銅器，如提鍊壺與蓋豆，以及江浙一帶典型器物，如獸面鼎、蟠蛇紋尊、盤，與紹興坡塘M306中出土各器接近。[40]出土印紋陶罐也與六合、丹徒出土者接近。原報告綜合九女墩M3各類器物風格，並結合史籍文獻中有關徐國的記載，認爲九女墩M3應當爲春秋晚期徐國王族墓葬，爲目前在史載徐國範圍內出土的第一座徐國貴族墓。

浙江紹興坡塘M306

1981年底，浙江紹興坡塘當地磚瓦場取土時，發現了六件青銅器，包括鼎、鐎盉、盥盤（原報告作鑑）等。1982年初經文物單位發掘，清理出一個帶階梯墓道及壁龕的土坑墓（M306）。墓僅存東半部及墓道，墓西端完全被破壞、不存，發掘清理中發現墓室已經被盜掘擾亂。壁龕位於南壁，西端已被破壞，龕內有數件銅器、陶器，一銅質房屋模型。壁龕下方有一土台，上置銅器、漆器、漆盒、玉器、瑪瑙等。另出土銅刀、銅削、刻刀等工具，與瑪瑙玉器等小器物原本可能盛於漆盒中。土台上的一個漆盒內並出土一件嵌玉耳金舟。土台西端被破壞部分尚有銅器印痕，推測盥盤可能出土於此。土台以北，墓室中部偏南位置，在一片東西走向、長方形的範圍內，出土許多玉質、石質裝飾品，其間偶見骨渣，可能爲墓主人位置所在。墓室其他部分不見遺物，恐已遭擾亂。該墓出土玉器以及印紋「軟陶」的風格接近春秋晚期，部分銅器也有春秋中晚期特色。惟原報告認爲帶銘徐器在越地出現，表明此墓年代當在越滅吳之後，因此將墓年代定爲戰國初期。[41]牟永抗依據出土的削刀刻刀以及不見兵器，推測墓主人可能爲文職人員。[42]該墓學者多以爲屬越國貴族，[43]但對於墓主人的確切族屬，因其中兩件帶銘徐器，衍生了或徐人或越人的看法。[44]

[40] 孔令遠，〈試論邳州九女墩三號墩出土的青銅器〉，《考古》2002 (5): 81-84。
[41]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紹興30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學者一般同意原報告斷代，如《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5》（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劉彬徽，〈吳越地區東周銅器與徐楚銅器比較研究〉。但也有認爲應當爲春秋晚期，如張鐘雲，〈淮河中下游春秋諸國青銅器研究〉，《考古學研究（四）》：140-179（科學出版社，2000，北京）。
[42] 牟永抗，〈紹興306號越墓芻議〉，《文物》1984(1): 35。
[43] 見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紹興30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牟永抗，〈紹興306號越墓芻議〉；鍾遐，〈紹興306號墓小考〉，《文物》1984(1): 36-37。
[44] 劉彬徽，〈吳越地區東周銅器與徐楚銅器比較研究〉，頁197。

紹興306號墓中出土的銅器中，湯鼎、爐與罍均帶銘文。其中罍的銘文無法辨讀，鼎與爐則均爲徐國鑄器。[45]墓中出土的銅器中，湯鼎與淅川下寺楚墓出土小口鼎（如M1：70；M2：56；M3：4）近似；[46]圜底鼎與淅川下寺M2:17鼎接近；罍（亦有稱缶者）的形製接近江蘇丹徒諫壁出土的罍；[47]鐎盉爲江南所常見；甗盉見於安徽舒城、湖南衡南；獸面鼎（殘）曾在舒城出土；[48]小銅壺與安徽屯溪出土的雲紋簋（M3：10）形體近似；[49]而帶芒刺紋飾的尊爲典型江浙地區風格的銅器。銅質房屋模型則爲僅見，但其上所飾的勾連回紋與勾連雲紋是江浙一帶特有的紋飾。是以除湯鼎、圜底鼎以外，出土的銅禮器均不出江南一帶所見種類。

浙江紹興鳳凰山墓M2、M3

紹興鳳凰山M2、M3分別於1975及1997年發現，時間間隔二十餘年。墓葬性質年代接近，均爲戰國時期土坑豎穴木槨墓。M3爲東西向，木槨分爲前後二室，前室大，應爲放置墓主處，但不見骨架，僅鋪有竹席，無棺木。前後室均有隨葬品，出土玉石器、銅劍銅鏃、泥質黑陶、原始青瓷、印紋硬陶等。其中一件玉矛上刻有鳥篆文，有「戊王」、「不光」等字。[50]仿盥盤陶器爲泥質黑陶，與陶鼎同出於墓前室的西端。仿銅器尚有有蓋鼎、壺與甗。另有兩個三足原始瓷盤，形製與盥盤接近，環耳，但似無紋飾。發掘簡報將該墓定爲戰國中期。

M2爲南北向，有一棺一槨，槨不分室，隨葬器物集中出土於墓室南端、棺與槨之間，包括仿銅陶器、印紋陶、漆器、木器等。仿盥盤的陶器有兩件，原報告作三足盤。[51]其他的仿銅陶器還有盉、甗、有蓋鼎、獸面鼎、匜、壺、敦。其中有蓋鼎與甗的形製與M3基本一致。除盥盤外，紹興鳳凰山兩墓仿銅陶器中的有蓋鼎、獸面鼎、盉、三足盤與貴溪崖墓所出也很接近。

[45] 有關銘文的討論可見：
曹錦炎，〈紹興坡塘出土徐器銘文及其相關問題〉，《文物》1984(1): 27-29。
劉廣和，〈徐國湯鼎銘文試釋〉，《考古與文物》1985(1): 101-102。
董楚平，《吳越徐舒金文集釋》，頁303-11（鼎），313-14（爐）（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1992）。
陳昭容認爲湯鼎應爲燒熱水的鼎，屬於盥洗用具。見〈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關問題〉，頁862-63; 875-76。

[46]《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北京，1991）。

[47] 鎮江市博物館，〈江蘇丹徒出土東周銅器〉，《考古》1981(5): 409-10；圖版3: 4, 6。又見《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5》，頁40-41（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

[48] 有關甗盉及獸面鼎的出土位置，可見李國梁，〈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銅器〉，《文物研究》1990(10): 162-190。

[49]《安徽省博物館藏青銅器》，圖版三五（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上海，1987）。有關討論可見周亞，〈吳越地區土墩墓青銅器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從安徽屯溪土墩墓部分青銅器談起〉，《吳越地區青銅器研究論文集》，頁67（兩木出版社，香港，1997）。

[50] 原報告引曹錦炎〈越王嗣旨不光劍銘文考〉（《文物》1995(8): 73-75），認爲「不光」爲越王翳的別名。

[51]〈紹興鳳凰山木槨墓〉，《考古》1976（6）:393。

浙江餘杭崇賢M1

1984年餘杭崇賢因施工取土，發現了三座戰國墓，出土一批原始瓷器，旋即爲人收購。部分器物經考古單位追查後收回，但其中M1、M2因取土，墓室遭嚴重破壞，考古人員搶救發掘時已無法判斷墓葬形製與出土器物等相關資料。M1僅由考古人員收集19件原始瓷器，並無其他訊息。原始瓷器中有三件盥盤（原報告作雙耳鑑）、四件甬鐘、一鐎盉、一獸面鼎、二束腰鼎、一洗（與九女墩M3銅盤形製類似）、一匜，及六件權形器。其中鐎盉、獸首鼎與鳳凰山、貴溪出土者一致。

浙江上虞董村牛山M17

上虞牛山戰國墓M17爲1995年當地配合基建搶救發掘時發現，當時共清理17座墓，僅M17屬戰國時期。M17爲長方形土坑墓，出土三十多件原始瓷、印紋硬陶、陶器。已發表的器物圖除盥盤以外，尚有釜形鼎、越式鼎、有蓋鼎、及鐎盉。[52]其中有蓋鼎與鳳凰山M3的兩件鼎（M3：49,55）相近，釜形鼎（M17：13）與江西貴溪M10中的 III式鼎（M10：3）接近，另二越式鼎與江西貴溪M10的IV式鼎（M10：7,9）相同。鐎盉（M17：13）則與江西貴溪M10，紹興鳳凰山M2出土鐎盉一致，顯示上虞牛山M 17的年代、性質與江西貴溪M10，紹興鳳凰山M2、M3接近。

嶺南地區

廣東羅定南門垌M1

1977年廣東羅定南門垌在當地進行水利工程時發現一批青銅器，分別屬於三個長方形豎穴土坑墓（M1-3），其中絕大多數器物出自M1。由於器物均爲採集，已無出土相關位置，主要爲青銅兵器，如矛、劍、鉞、鏃、戈、斧等。另有青銅容器、樂器，以及青銅人首柱形器。除了一件盥盤（M1：5）以外，還出土一件個體較小，紋飾不同的銅鑑或盤（M1：6），與九女墩M3出土者相近。所出的三件鼎，兩件屬越式，一件則明顯爲外來器物（M1：1）。[53]其他相當於禮樂器的青銅器還有一盉、一缶、一鉦，以及六件鐘。

[52] 圖版參見《浙江考古精華》，頁191-196。
[53] 參見後注[64]。

廣東羅定背夫山M1

廣東羅定背夫山一號墓於1983年發掘，爲一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出土器物亦以青銅兵器、工具爲主。屬於禮樂器的青銅器有一件鑑（M1：66）及一件盥盤（M1：62）；另有兩件越式鼎，及一件鐸。其他器物還包括青銅人首柱形器、原始釉陶、玉石器等。發掘者依據出土的陶器及銅戈，將一號墓的年代定爲戰國早期。[54]

背夫山一號墓的隨葬器物沿墓葬的縱軸走向排列。墓葬南段出土器物似乎以盛容器爲主，放置了銅鼎、原始瓷杯、陶豆；中段以工具、兵器爲主，出土有鏃、劍、戈、斧、鋸、篾刀等；盥盤與銅鑑均位於墓坑的北段。北段另放置了一件鐸，數件矛及短劍等。

廣州南越王墓

廣州南越王墓中的盥盤出土於主棺室後的後藏室。後藏室共出土130餘件器物，包括銅器、陶器、鐵器、滑石器、漆器、封泥等；另有大量家畜、家禽、水生動物、貝類的遺骸。原報告認爲後藏室「是儲藏食物和放置炊器與儲容器的重要庫藏」，[55]同出的13件「泰官」（即太官）封泥也與掌管膳食有關。[56]原報告中稱爲鑑的器物還有兩件，個體較大，均帶提鍊，器內均發現牛、豬、雞、龜等動物遺留。盥盤出土位置在後藏室的東北角。鄰近的器物主要爲銅鍪、銅鼎，其中往往有動物及貝類遺留，器表亦有煙熏痕跡。南越王墓因爲出土了「文帝行璽」的金印，發掘者認爲屬於西漢初年、第二代南越王的墓。[57]

四、討論

從以上敘述可知，目前已知的盥盤數量並不多，除了山彪鎮的例子以外，其出土分布的範圍包括了湘贛、江浙、嶺南的廣大區域，涵蓋了史籍中徐國（徐王義楚盥盤，但出土地點已不在徐國範圍）、吳國和越國（北山頂、坡塘、鳳凰山等），以及百越等（湘鄉、貴溪、背夫山、南門垌、廣州）的範圍。[58]從考古遺留看，湘贛、江浙、嶺南地區有其獨立的地方傳統，又因處中原禮制政治系統的邊緣，與中原區域文化互動頻繁，所呈現的物質文化面貌往往較爲複雜。以紹興坡塘M306爲例，有屬於

[54]〈廣東羅定背夫山戰國墓〉。
[55]《西漢南越王墓・上》，頁273。
[56]《西漢南越王墓・上》，頁309：「泰官即太官、大官」。並引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太官主膳食」。
[57]有關南越王年代、墓主身份的討論，參見《西漢南越王墓・上》，頁319-325。
[58]目前學者傾向於把兩廣地區、湘贛、東南沿海的類似青銅文化歸爲史籍記載中的古越人，如何紀生、何介鈞，〈古代越族的青銅文化〉，《湖南考古輯刊》1986(3): 215-239；黃展岳，〈論兩廣出土的先秦青銅器〉，《考古學報》1986(4): 409-434；李龍章，〈湖南兩廣青銅時代越墓研究〉，《考古學報》1995(3): 275-312。

江浙吳越風格的銅屋模型、銅尊；有屬於楚系風格的湯鼎及圜底鼎；亦有見於皖南的獸面鼎。以丹徒北山頂墓爲例，其中的車馬器、編鐘、各式銅鼎與中原及楚地器物並無二致，其中的鳩杖、錞于、懸鼓環則爲當地特色。而廣東南門坪、背夫山兩墓隨葬以工具、兵器爲主，是當地的特色，人首柱形器更僅見於兩廣；禮、樂器則多源於中原或楚地。這些都充分反映春秋戰國時期，中原、荊楚、湖廣、江浙之間政治文化上密切的接觸與往來，[59]但也替判斷盥盤究竟屬於當地因素或爲受其他地區外來影響帶來困難。

如上所述，春秋戰國時期在長江中下游、嶺南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尤其是容器、禮器，可明顯看出有屬於本地以及屬於外來影響的兩個系統，而受外來影響的銅器又往往以中原以及楚地的因素最顯著。這其中又包括了與中原、楚地青銅器器形風格完全一致的，以及在中原、楚地風格基礎上稍稍加以變化的。[60]最後這類器物，學者認爲也應屬於當地鑄造。[61]中原或楚地風格銅器在湘贛、兩廣、江浙一帶的出現，一般認爲是楚文化向南、向東擴張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影響。[62][63]而這些器物的成組出現，恐怕也反映了中原楚地禮制與上層貴族文化向這些地區的傳播。本文所討論的盥盤，其形製和紋飾的布局與中原及楚的銅器傳統接近，如兩道主紋以綯索紋區隔，最下層紋飾爲三角紋的紋飾布局。雖然浮雕蟠虺紋不見於中原或楚地，但盥盤的整體風格與所謂的吳越、兩廣地區當地青銅器風格的差距較大，因此一般也歸於在中原、楚

[59] 有關中原與楚地對兩廣江浙地區的影響，學者討論很多，參見：
蔣廷瑜，〈楚國的南界和楚文化對嶺南的影響〉，《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頁67-73（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
徐恆彬，〈試論楚文化對廣東歷史發展的作用〉，《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頁74-79（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
徐恆彬，〈廣東青銅器時代概論〉，《廣東出土先秦文物》，頁45-63（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1984）。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漢，1995。
李龍章，〈湖南兩廣青銅時代越墓研究〉，《考古學報》1995(3): 275-312。
臧振華，〈中國東南地區出土先秦青銅器的社會涵義〉，《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1995(50): 230-239。

[60] 這一現象學者討論廣泛，參見：
馬承源，〈長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銅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四期（1987）：198-220。
劉彬徽，〈兩廣先秦青銅器研究〉，《東南文化》1991(1): 122-125。
李國樑，〈吳、越、徐青銅器概述〉，《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5》，頁1-29（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

[61] 如馬承源，〈長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銅器的研究〉；劉彬徽，〈兩廣先秦青銅器研究〉。

[62] 參見注[59]所引書目；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漸》（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漢，1996）；劉和惠，《楚文化的東漸》（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漢，1995）。

[63] 蔣廷瑜依據文獻，認爲楚國的南界已經越過南嶺，進入瀟水流域。見〈楚國的南界和楚文化對嶺南的影響〉。李龍章認爲楚的向南擴張，迫使湘江中下游的越人向湘南遷移，進而越過嶺南，從而引進各種文化因素，但楚的勢力並沒有直接進入嶺南。見〈湖南兩廣青銅時代越墓研究〉，頁308。從考古材料看，李說爲是。

地風格基礎上稍稍加以變化的器類。[64]也有學者把兩廣、江南這類器物分別歸屬於兩地所自行鑄造。[65]

從上文的比較，可以發現各地出土盥盤的形製，尤其紋飾，幾乎如出一轍，不能不讓人聯想這類器物是否同屬某一地或某一國，乃至於是某一作坊的產品。但盥盤分布的範圍較廣，無法用一個地理區域或一國的範圍來概括，如其爲同一地的產物，也必須解釋它是透過何種方式傳播至各地；這些都是現有材料還不能及的。盥盤出土的範圍似乎與一般認爲的古越族活動範圍相合，而與之同出的帶銘銅器又每有徐國鑄器，因此也有學者將盥盤考慮爲古越族或徐國的器物。物質文化與族屬是否能做直接聯繫還有待考古學上進一步的驗證，而徐國銅器散見各地，徐國銅器的判斷基本依靠銘文，其本身的面貌並不清楚，要討論這類器物究竟歸屬於哪個國別或族屬，目前的材料恐怕並不十分充足。

然而如果進一步考慮盥盤的來源，並把仿銅陶器也列入考慮，那麼盥盤的主要分布範圍應當是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爲主，包括了湘贛、江浙等地。而由仿銅陶器，特別是仿銅原始瓷的例子來看，這類器物尤其盛行於長江下游的江浙一帶。由於同一墓中往往出土數個相同的仿銅盥盤，其在當地葬俗裡也可能有一定重要性。嶺南的青銅禮樂器由於大部分屬於外來器物，沒有明顯的「禮器制度」，[66]而嶺南出土盥盤的形製（C2及C3類；另南門垌M1：6小鑑亦與江蘇邳州所出銅盤相近），與江南地區出土的盥盤並無二致，因此這類器物可能爲外來，而不屬於嶺南當地青銅文化傳統，其在嶺南出土應當多少反映了嶺南與江南乃至於長江下游之間的聯繫。

青銅盥盤做爲上層貴族的器物，應當與貴族的禮制文化結合，其較集中地出土於長江中下游，而在中原或楚地極少見，這是否表示它所反映的用途甚至禮制與中原楚地的禮器有所不同？盥盤的數量不多，所出墓葬的差異也較大，從北山頂的大型貴族墓，紹興坡塘的中型墓，到嶺南的中型墓，墓葬性質、規格變化均大，再兼以早期的零星發現未經過科學發掘，出土關係乃至於細部年代的資料不足，使有關盥盤這類器物搭配組合與用途等的訊息相當缺乏。以下僅做初步的觀察。

北山頂盥盤出土於墓坑平台，與殉人同出，可能不屬於墓主的隨葬器物，器物組合上可以不予考慮。如果考慮仿銅陶器屬於當地製作，且可能專爲該墓埋葬使用，沒

[64] 劉彬徽列舉了包括南門垌M1:1的銅鼎，紹興坡塘M306罍，羅定M1的鑑／盥盤等數件器物。這類器物在形製上與中原或楚地銅器接近，但往往飾以兩地不見的紋飾。劉彬徽稱之爲中原式或楚式銅器，以與中原器或楚器區分。見〈兩廣先秦青銅器研究〉。

[65] 李龍章，〈湖南兩廣青銅時代越墓研究〉；劉彬徽，〈兩廣先秦青銅器研究〉。

[66] 黃展岳，〈論兩廣出土的先秦青銅器〉，頁426。

有器物來源或數量上的限制，其所反映的器形組合可能因此比較完整。換言之，仿銅陶器做爲可以負擔得起的（affordable）隨葬品，可能直接反映了當地隨葬器物組合。從這個角度看，江西貴溪崖墓M10，紹興鳳凰山M2、M3，餘杭崇賢、上虞牛山的仿銅陶器、原始瓷值得進一步觀察。與盥盤一同出土的銅器、仿銅陶器，如此主要爲鼎（包括楚式鼎、越式鼎）、獸首鼎（紹興坡塘、邵州九女墩、紹興鳳凰山M2、餘杭崇賢、上虞牛山）、鐎盉（如江西貴溪M10，紹興鳳凰山M2、M3，紹興坡塘，羅定背夫山M1、羅定南門垌M1），及甗（如紹興鳳凰山M2、M3，紹興坡塘）；有時也搭配壺（紹興鳳凰山M2、M3）、敦（紹興鳳凰山M2），盆、洗、匜一類器物（如江西貴溪崖墓M10，紹興鳳凰山M2、M3）。同出器物中越式鼎、鐎盉與獸首鼎尤具區域風格。這裡所引的器物組合材料不夠全面，但初步看來，這樣的搭配，與同時期中原、楚地常見的器物組合不完全相同，[67]或許反映的是長江中下游，尤其是江浙一帶隨葬器物組合的特色。

雖然目前學者多將盥盤的形製與吳王夫差鑑這類器物做聯繫，[68]但是兩者器形雖然接近，大小仍舊有別，從紋飾看，夫差鑑爲羽翅紋，盥盤爲幾何折線搭配浮雕圈點，也有不同。盥盤這種特有的紋飾在江淮出土的盆上可以找到類似的蹤跡，如春秋早中期江淮地區黃國銅器的傒子宿車盆（圖二十九；河南羅山出土），[69]及子諆盆（圖三十；河南潢川出土）。[70]這類盆的紋飾爲交錯相交的折線，線上並帶有多個浮雕



圖二九　河南羅山出土傒子宿車盆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1》，頁103（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



圖三十　河南潢川出土子諆盆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1》，頁104（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

[67] 春秋晚期中原的常見組合爲：鼎簋舟盤匜，鼎豆罍盤匜；楚地爲：鼎簠缶盤匜，鼎簠敦缶盤匜。戰國早期中原的常見組合爲：鼎豆壺盤匜；楚地爲：鼎簠敦壺盤匜。戰國中期兩者皆爲：鼎敦壺盤匜。見劉彬徽，〈楚國青銅禮器初步研究〉，《中國考古學年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頁113（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

[68] 如彭適凡，〈談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稱問題〉；李龍章，〈湖南兩廣青銅時代越墓研究〉。

[69] 信陽地區文管會等，〈羅山縣高店公社又發現一批春秋時期青銅器〉，《中原文物》1981(4): 18-21; 圖版6: 3。參見《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1》，頁103（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

[70] 信陽地區文管會等，〈河南潢川縣發現黃國和蔡國銅器〉，《文物》1980(1): 46-50; 圖11。參見《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1》，頁104-105（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

乳釘，但紋飾排列寬鬆，不若盥盤上的浮雕圈點蟠虺紋緊密。盆器身的最大徑在肩部，肩部以下收束，平底，肩部帶兩個銜環扁平獸首耳，形製上與盥盤也有一些神似。[71]不過盆一般均帶器蓋，無足，用途則可爲盛食器、可爲水器。[72]由於江西靖安出土的盥盤爲徐器，黃國銅器上也有類似風格的紋飾，那麼浮雕圈點蟠虺紋也有可能是本於江淮地區青銅器系統的風格，而其盛行於江南地區則是可以認定的。

另外靖安所出的盥盤銘文自名之爲盥盤，如彭適凡、陳昭容所示，應爲水器。然而出土盥盤有使用痕跡或明顯出土關係的例子，如北山頂、南越王墓，似乎都顯示將盥盤做爲炊具。這是否反映了不同地區或不同時期，盥盤的用途或使用方式、場合有所轉變，甚或脫離了原本的禮器使用框架，而另爲他用？這些仍有待更多的材料進一步斟酌。

從以上的比較可以得知，山彪鎮一號墓出土的這件盥盤應當是屬於南方系統的青銅器，是長江中下游一帶青銅文化的產物，而盥盤這類器物在中原貴族大墓中出土，自然反映了當時三晉地區與南方的交通。除盥盤在山彪鎮大墓出土外，也有其他帶銘文南方銅器在三晉出土的例子。[73]不過與上述中原楚地銅器經常成組在南方出土相比，南方銅器在北方的數量明顯較少。以山彪鎮一號大墓爲例，出土的其他銅器，如列鼎、編鐘、鑑等，不論從形製紋飾看，均屬於典型晉系風格，而除盥盤以外，並沒有搭配其他屬於南方的銅器，這與江南大墓中成組出土的中原楚地銅器相較，對比鮮明。臧振華曾就兩廣、福建出土青銅器的政治社會涵義做過分析，認爲外來銅器的出現反映了當地族群與中原、楚、吳、越等族群互動密切，並表現了當地統治階層藉由中原楚地銅器來表達地位與身份。[74]如果北方成組青銅禮器在南方出土反映的是中原禮制的傳播或影響，乃至於對中原貴族文化的認同，那麼山彪鎮一號大墓中僅有一件南方銅器，其所代表由南方地區向北方中原的影響層面，相對而言就比較局限。銅器做爲上層貴族身份地位的表徵以及物質生活、儀式禮制中的必需品，自然成爲國與國、貴族與貴族間會盟、遺贈、媵女等的媒介，甚或成爲戰爭中掠奪和擄獲的對象；而除了兩國之間的直接來往，也有將第三國銅器做爲交換對象的，左傳中記載魯國用吳國的銅器賞賜給晉國公卿即是一例。[75]山彪鎮大墓出土了這件盥盤，其背後的機制恐怕較多地反映了國與國、貴族與貴族之間的往來，而不是南方出土中原楚地銅器所代表的禮制與文化上整體的影響。而其歷史背景和楚、徐、吳、越等南方各國的興衰與其勢力在中原的互相消長、時進時退也應當息息相關。

[71] 有關盆的討論，可見陳芳妹，〈盆、敦與簋—論春秋早、中期青銅粢盛器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卷、第三期 (1985)：63-118。

[72] 陳昭容，〈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關問題〉，頁869。另山彪鎮出土的鳥蟲書錯金戈可能與吳越有關，目前尚無定論。參見袁國華，〈山彪鎮一號大墓出土鳥蟲書錯金戈銘新釋〉，《古今論衡》2000(5):17-29。

[73] 參見陶正剛，〈山西出土的吳越地區青銅器及其研究〉，《吳越地區青銅器研究論文集》，頁205-212（兩木出版社，香港，1997）。

[74] 臧振華，〈中國東南地區出土先秦青銅器的社會涵義〉。

[75] 左傳襄公十九年：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出土地點	器名	類別	唇	口沿下	肩折稜	腹	下腹	絢索紋	耳	足	本文圖號
浙江紹興坡塘M306：采5	盥盤	A	雷紋	圈點蟠虺紋	雷紋	圈點蟠虺紋	素面	三	無	無	6
江蘇邳州九女墩M3：34	盤	(A)	素面	斜雲雷紋	?	斜雲雷紋	三角紋	二	無	無	7
廣東羅定南門垌M1：6	盤	(A)	素面	斜雲雷紋	三角紋	斜雲雷紋/三角紋	素面	一	無	無	8
汲縣山彪鎮M1：43	盥盤	B1	素面	圈點蟠虺紋	素面	圈點蟠虺紋	三角紋	三	環耳	無	1
江西靖安	盥盤	B2	雷紋	圈點蟠虺紋	雲雷紋	弦紋	弦紋	一	獸首鐶	無	11
湖南湘鄉牛形山	盥盤	C1	雷紋	圈點蟠虺紋	雷紋	圈點蟠虺紋	交龍/三角紋	三	獸首耳銜環	蹄足	13
台北故宮博物院	盥盤	C1	素面	圈點蟠虺紋	素面	圈點蟠虺紋	素面	三	環耳	蹄足	14
江蘇丹徒北山頂MJB：10	盥盤	C2	素面	圈點蟠虺紋	素面	圈點蟠虺紋	三角紋	三	獸首鐶	蹄足	17
鎮江金壇縣薛埠公社東進大隊	盥盤	C2	?	圈點蟠虺紋	?	圈點蟠虺紋	?	三	獸首鐶	蹄足	18
廣東羅定背夫山M1：62	盥盤	C2	素面	圈點蟠虺紋	雲雷紋	圈點蟠虺紋	三角紋	三	獸首鐶	蹄足	19
Seattle Art Museum	盥盤	C2	雷紋	圈點蟠虺紋	素面	圈點蟠虺紋	三角紋	三	獸首鐶	蹄足	20
廣東羅定南門垌M1：5	盥盤	C3	素面	圈點蟠虺紋	素面	圈點蟠虺紋	三角紋	三	獸首鐶	尖狀足	21
廣州南越王墓	盥盤	C3	無	圈點蟠虺紋	雲雷紋	圈點蟠虺紋	三角紋	三	獸首鐶	片狀足	22
江西清江	盥盤	C3	雷紋	圈點蟠虺紋	雷紋	圈點蟠虺紋	三角紋	三	僅存柱頭	尖狀足	23

表一：青銅盥盤紋飾形製簡表

出土地點	器名	類別	高度（cm）	口徑（cm）	本文圖號
浙江紹興坡塘 M306：采5	盥盤	A	16.5	40	6
江蘇邳州九女墩 M3：34	盤	(A)	10	22.6	7
廣東羅定南門垌 M1：6	盤	(A)	10.5	23	8
浙江紹興鳳凰山 M3：1	原始瓷缽	(A)	7.4	18.3	9
浙江餘杭崇賢 M1：15	原始瓷洗	(A)	6.4	15.4	10
汲縣山彪鎮 M1：43	盥盤	B1	13.7	35.7	1
江西靖安	盥盤	B2	14	37.6	11
浙江餘杭崇賢 M1：11	原始瓷盥盤	B2	8.3	20.6	12
湖南湘鄉牛形山	盥盤	C1	14	32.9	13
台北故宮博物院	盥盤	C1	12.4	27.1	14
江蘇丹徒北山頂 MJB：10	盥盤	C2	11.1	26.6	17
鎮江金壇縣薛埠公社東進大隊	盥盤	C2	12.8	32	18
廣東羅定背夫山 M1：62	盥盤	C2	15.5	35.2	19
Seattle Art Museum	盥盤	C2	12.7	29.21	20
浙江紹興鳳凰山 M2：13、14	黑陶盥盤	C2	9	24	25
浙江紹興鳳凰山 M3：50	黑陶盥盤	C2	10	27	26
浙江上虞牛山 M17：20	原始瓷盥盤	C2	10	22	27
江西貴溪崖墓 M10：6	黑陶盥盤	C2/C3	10	24	24
廣東羅定南門垌 M1：5	盥盤	C3	14.2	36.6	21
廣州南越王墓	盥盤	C3	15	35	22
江西清江	盥盤	C3	18.1	42	23
廣東羅定背夫山 M1：66	鑑		24.2	40.8	15
淅川下寺 M3：19	鑑		20.5	39.8	16
河南羅山傒子宿車盆	盆		29	31.8	29
河南潢川子諶盆	盆		19.2	28	30

表二：本文所引青銅、仿銅盥盤大小